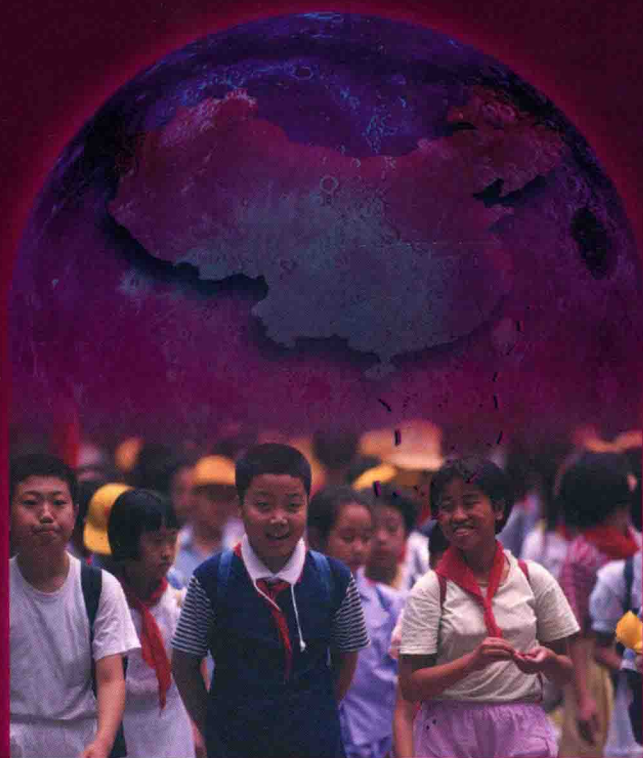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人口地理

张善余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

中国人口地理

张善余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之一。书中利用全国最新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发展特点、历史过程、种族与民族、人口再生产、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城市人口、人口迁移与流动等内容,并从人口地理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流动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热点问题。全书具有新颖性(资料最新)、系统性和唯一性(国内无同名著作)。

本书可供地理、社会、经济等学科领域的大学师生、学者和广大实际工作者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吴传钧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03-048209-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人文地理学—中国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4604

责任编辑:吴三保等/责任校对:刘小梅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 1/4

字数:640 000

定价:3680.00元(共12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胡焕庸 周立三 宋家泰 钱今昔

主 编 吴传钧

副主编 郭来喜(常务) 王恩涌 许学强 陈宾寅

沈道齐 李润田 吴三保 黄效文 陈宗兴

邬翊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希贤 王 铮 王兴中 王恩涌 刘 毅

刘君德 刘继胜 邬翊光 许学强 张小林

张文尝 张绍飞 张家楨 张耀光 陆大道

陆俊元 吴三保 吴传钧 吴建藩 吴楚材

李小建 李文彦 李润田 李振泉 陈 航

陈宗兴 沈伟烈 沈道齐 杨吾扬 邹逸麟

周一星 周尚意 周钜乾 金其铭 金学良

姚士谋 姚岁寒 郭来喜 郭焕成 黄效文

崔功豪 鲁 奇 谢让志 谢香方 彭 斌

蔡人群

学术秘书 陈 田 毕金初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问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科学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80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传钧

1998年中秋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新世纪迤降,纪元晋双千,地理学发展迈入多元多维结构的全息化时代。向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既表征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意义重大,又展示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强大生命力。

若把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5与16世纪之交航海引起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地理研究空间的大拓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激发了推动力,从而导致近代地理学的萌发,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航天地理学应运而生,“人地关系”将进一步演变为“人宇关系”,可以预见21世纪中期,将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效应。人类的“天地生人巨系统”观会赋予地理科学研究全新的内涵,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将推动地理科学产生巨大的变革,不过人地关系仍将是研究的基础。

人文地理学是以研究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变化规律和地域分异系统为基本宗旨。作为世界上最高智能动物群体的人类,从其诞生之时,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人类的繁衍与发展既受人类社会形态与结构的支配,也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有的学者把地理演化史分为天文时期、地文时期和人文时期,而人文地理学则是研究人文时期的人地系统,亦即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形成、演化、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人地关系论(man-nature relationship)作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古典地理著作中便有所论述。《山海经》、《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我国古典地理学发轫期的杰出代表作。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对人地关系先后产生了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思想、天人相关论以及因地制宜等不同流派。尽管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乃至唐代刘禹锡主张人地相关论等,对人文地理学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从而阻碍了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科学。

近代人文地理学萌生源于西方国家。德国地理学大师李特尔(Karl Ritter)堪称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者,他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统一性,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应从观察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和假设出发,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1822~1859)这一著作中,探讨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嗣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同时,又主张由于有人类因素,地理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1882, 1891)、《政治地理学》(1897)、《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1901)、《民族学》(1885, 1886, 1888)、《地球与生命:比较地理学》(1901, 1902)等,对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所有对人文地理有贡献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19世纪后半叶,德、英、法、美、俄等国学者在阐述人地关系时,先后出现了“地理环境

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以 F. 拉采尔、E. 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E. 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代表;“二元论”(dualism)——以 O. 佩舍尔(Oscar Peschel)、F.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 A. 彭克(Albrecht Penck)为代表;“或然论”(possibilism)——以 P. 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和 G. 弗勒(Herbert G. Fleur)为代表;“适应论”(adaptablism)——以 P. 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为代表;“文化景观论”(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以 O. 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S. 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和 C. 索尔(Carl Owtwin Sauer)为代表;“协调论”(adjustablism)又称“和谐论”(harmony)——以 B. A. 阿努钦(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учин)、M. 怀斯(Michael John Wise)为代表。这些学术流派先后传播到中国,对近代人文地理学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ui, 1552 ~ 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 ~ 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 1559 ~ 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 ~ 1688)、法国人白晋(Joach Bouvet, 1656 ~ 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 ~ 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 ~ 1774)等。19 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 ~ 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 1866 ~ 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 1870 ~ 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 1882 ~ 1955)等。

20 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镔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 ~ 1949 年共出 6 卷,发表论文 136 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 56 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20 世纪 30 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30 年代中期任美镔、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maina),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n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原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原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原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绝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

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论题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工作(20世纪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①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②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③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④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⑤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⑥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⑦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我清晰地记得,李旭旦先生做完学术报告后,1980年元旦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郭敬辉先生召开敬老座谈会,出席会议的12位70岁以上的老地理学家(如今大多作古)中,有不少多年没有参加过全国性学术会议,出席广州盛会激动不已,座谈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的董绍良先生说:“我20年代就接触人地相关论,这次会上听大家谈人文地理学,我真像遇到久别的老友一样,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为了繁荣人文地理学而勇于创新”。

然而就在会后不久,有着失落感在“文革”中又自命为“红线代表”的某位以批判他人出名的人物,在座谈会上做了肤浅应景式检讨和言不由衷的道歉后,竟又炮制新的“批判”大作,罗织罪名,妄图把复兴人文地理之举,当作“回流”、“复辟”、“新动向”,再度置人于死地,李旭旦先生首当其冲。《西北师范学院院刊》把李先生的复兴人文地理学的论文和“批判”文章同时刊登,更增添了对他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委托李旭旦和吴传钧先生担任人文地理学分册主编,1981年冬在上海举行大百科条目研讨会,李先生忧心忡忡,此时,吴先生劝慰说:“难道您还怕戴第二次帽子?!时代不同了,不必理那一套!”

1982年2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人文地理的重要讲话,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特别把人文地理学列为要加强的薄弱学科之一,从最高层次支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使一度对人文地理持否定态度的“批判家”不得不偃旗息鼓,这不

能不说是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

为了适应人文地理学新发展,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1年5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杭州会议决定成立人文地理研究筹备组,推举8位学者为成员,李旭旦先生任组长;1983年5月在南宁举行首次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吴传钧先生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组,李旭旦先生为组长。198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专业委员会会议。在吴传钧先生主持下,1984年7月教育部高教司和中国地理学会联合在北京举行人文地理讲习班,加速培养高校人文地理师资。之后中国地理学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学院又举办了几期人文地理师资培训班,使人文地理师资培训和科学普及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李旭旦先生作为首任专业委员会主任抱病参加了第一次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会议,做了“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讲话。李先生强调复兴人文地理学不是复旧,要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准则,走正路,技术手段必须创新,论题内容要创新,要采取实地考察与社会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向人文地理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进军……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人文地理讲习班,但他仍以教育家的智慧和极大的注意力关注这项活动。在张文奎、邬翊光、郭来喜协助下,他主编了《人文地理论丛》、《人文地理概说》两本论文集。

李旭旦先生的仙逝,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在吴传钧先生直接领导下,由鲍觉民、张文奎先生主持的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人文地理学研究教育得以蓬勃发展,学科理论建设和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更上一层楼。鲍、张两先生的辞世,又一次使人文地理学界蒙受损失!

综观近14年来,我国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85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在西安举办的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在无锡召开的中英日城市地理学研讨会;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人文地理学研讨会;1990年8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会议;1990年11月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上海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3年5月与沿海开放研究分会在昆明共同举办的沿海沿边开放学术研讨会;1996年11月与自然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郑州联合举办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1997年6月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的人文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1998年4月在北京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从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分立出城市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还成立了全国高校人文地理教育与研究会,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人文地理教学与研究空前活跃,人文地理已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列入全国高校的必修课,有的大学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了重点专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设置了博士点、硕士点。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中美人文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中英文版,1988)、《人文地理研究》(1989)、《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等会议文集,吴传钧先生主编出版一套《人文地理学丛书》,创办了《人文地理》杂志(原名为《国外人文地理》)。一些学者还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专著,如《中国人文地理》、《现代人文地理》、《理论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概念》、《人文地理学》,以及多版本的《人文地理词典》等,还有更多的分支学科专著先后出

版。一大批青年人文地理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中坚,使中国人文地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以人地系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学科和核心地位更凸显出来。

钱学森先生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史出发,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时,明确指出以研究地球表层为对象的地理科学的内容与方法。他高瞻远瞩地指明:“地理科学是一门学科体系,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大部门之一,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地理系统是开放复杂的巨系统”,要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来研究。地理工作者要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从事“地理建设”,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来建设“地理科学”。黄秉维先生认为,钱学森先生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

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成果,从区域解释性描述和地理数据图表简式表述,向全球与区域的监测、规划、设计、调控、优化方向过渡,实现不同尺度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钱学森先生所期盼的“地理建设”和“地理科学”的前瞻性设想。

鉴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自然地理》(丛书),集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然地理学及各主要分支学科方面的成就,如今编辑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既是体现完整的中国地理学、全面评估中国地理建设成就的需要,也是为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实现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自 1992 年酝酿、策划出版《中国人文地理丛书》以来,先后在北京、昆明做了多次协商,又于 1996,1997,1998 年分别在开封、西安和北京召开三次丛书编辑委员会,集中讨论了丛书编辑的宗旨、书目、纲要、体例、结构、分工和进度,确立了精而准、系列化、中国化的撰稿原则。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位专家及其代表,一致表示争取在 1999 年完成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迎接 21 世纪来临的献礼。

借此良机,我谨代表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丛书编辑委员会,向为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做出贡献,参加丛书编辑出版,以及支持和赞助的各方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98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中关村

目 录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一	i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	iii
第一章 中国人口的历史演变和新中国人口的发展	1
第一节 中国人口历史演变的几个阶段	1
第二节 中国人口地理历史演变过程的总结	13
第三节 新中国人口的发展	22
第二章 中国居民的种族类型和民族构成	27
第一节 中国居民的种族类型	27
第二节 中国居民的民族构成	30
第三节 中国语言地理	46
第三章 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	49
第一节 概述	49
第二节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	51
第三节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	75
第四节 人口自然增长率	98
第五节 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105
第四章 中国人口的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	114
第一节 中国人口的性别构成	114
第二节 中国人口的年龄构成	127
第五章 中国的劳动人口	146
第一节 劳动适龄人口或劳动力资源	146
第二节 劳动人口的行业构成和产业构成	158
第三节 劳动人口的职业构成	188
第六章 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	191
第一节 人口文化素质的改善与分布差异	191
第二节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	204
第七章 新中国人口分布变动的几个阶段	207
第一节 1949~1958年:新中国成立促成活跃的人口再分布	207
第二节 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分布不正常的波动	213
第三节 1962~1978年:政策因素促使人口分布重心移向内地边疆	218
第四节 1979~2005年:新时期人口地理分布的新格局	227
第八章 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	243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	243

第二节 影响中国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262
第九章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	286
第一节 中国城镇人口的历史演变	286
第二节 新中国城镇人口的发展	293
第三节 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地区差异	328
第四节 乡村人口和乡村聚落	355
第十章 中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359
第一节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迁移	359
第二节 新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和分布	366
第十一章 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402
第一节 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402
第二节 资源、环境与中国人□发展	407
第三节 人口压力和人口承载力	425
第四节 21 世纪中国人口的展望	429
主要参考文献	432

第一章 中国人口的历史演变和新中国人口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人口历史演变的几个阶段

一、远古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和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人类学家已明确指出：“中国大约在 190 万年前就已有人科动物存在”（塔特萨尔，1997）。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元谋人，历史也长达 170 万年以上。

继元谋人之后，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始终有人类生息繁衍。近几十年来，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化石和文化遗址，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其中有一些，如 80 万年前的蓝田人，40 万 ~ 70 万年前的北京人，10 万年前的丁村人，3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等等，均构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中国原始人类的遗迹的地理分布是非常广泛的，这正是中国人口地理最初的雏形。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主要发现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湖北郧县、河南南召和三门峡、山西垣曲、安徽和县、辽宁营口以及贵州的桐梓和黔西，其年代距今约 40 万 ~ 80 万年。这一时期的人类属于直立人，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由更早期人类不懂得用火、基本上不会制造工具、实行毫无限制的杂乱性关系的原始群，转变到懂得用火、会制造工具、性关系只限于同辈之间的血缘家族公社。受食物来源限制，每一个这样的血缘家族同时生活在一起的人数都不可能很多；为了捕猎的需要及照顾幼婴，人数也不能太少，一般均在十几人到几十人（据推测，北京周口店人类群体规模为 50 ~ 60 人）。人口史专家认为，100 万年前世界总人口大约为 1 万 ~ 2 万，10 万年前为 10 万 ~ 20 万（瓦连捷伊，1978），而中国的人口通常占世界几分之一，由此可以约略推知几十万年前生活在现代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在几千人到一两万人之间。

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前，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在考古文化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其中 4 万年前属早期智人，他们体质上的原始特征尚未完全消失。而此后的晚期智人，在体质上与现代人已非常接近。

中国早期智人的遗址主要发现于陕西大荔、山西丁村和阳高、广东马坝以及湖北长阳，晚期智人的遗址分布更广，主要有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和来宾、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乌审旗、甘肃庆阳、四川资阳、云南宜良、江苏泗洪和台湾台南等地。

同直立人相比，智人的体质有了明显改善（身高增长，脑容量扩大），这不仅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营养水平的提高，也由于婚姻关系由血缘婚逐渐演变为族外群婚和对偶婚，到晚期智人时其社会组织形态也由血缘家族公社进步为母系氏族公社。第四纪冰期结束后，气候转暖，原始农业开始萌发，距今六七千年时，中国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的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中国古代神话中著名的伏羲氏和神农氏就是这种新型生产方式的生动代表。从此人类有了较可靠的食物来源，人

口也随之加速增殖,结果从一个母亲氏族逐渐衍生出若干女儿氏族和外孙女氏族,进而扩大为胞族、部落和部落集团。如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本是同出于少典氏的两个部落,前者原有 25 个氏族,后来发展为 14 个部落,此后不断繁殖,又产生出更多的部落。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国这块土地越来越充分地为人所占据,这一点从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已发现的这类遗址多达六七千处,其分布遍及全国,黄河中游地区尤其密集;如距今 6000 年前陕西省中部泔水一段长 20 公里的河岸旁,共建立了十几处村落,面积为几万至十几万平方米,一个氏族的人口多达到四五百人。

距今五六千年前后,母系氏族公社和对偶家庭逐渐向父系氏族公社和一夫一妻家庭演化,人口由此加速增殖,村落分布因此更加稠密。如泔水一段长 7 公里的河岸旁,村落有 8 个;河南省中西部洹水一段长 7 公里的范围内,村落多达 19 个,几乎和现代村落密度相同。

对于原始农业出现后短短几千年中人口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权威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巴勒克拉夫主编,1982)给予了高度评价:“人类(更确切地说,一定区域里的一定集团的人类)从狩猎者和捕鱼者转变为农耕者、从游荡的生活转变到定居生活的变迁,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正是由于生产力和人口的大发展,到公元前两千年终于导致原始社会解体,夏朝建立后,中国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的说来,原始社会具有人口发展非常缓慢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平衡的显著特点,人口再生产深受自然因素制约,死亡率极高,寿命很短,且男多女少,这种严重的性别比失调对人口发展也很不利。据联合国人口部门的数据,公元前 7000 ~ 前 6000 年世界总人口为 500 万 ~ 1000 万,公元前 3000 年为 2500 万 ~ 4000 万人。由此可以约略推知中国当时的人口在 100 多万至几百万之间,与几十万年前的一两万人相比,平均每 1000 年的增长率还不到 1%,由此足见人口增长之缓慢。

到公元前 21 世纪夏朝建立时,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中国总人口已达到 13 553 923 人。对于这个最早的、居然精确到个位的人口统计数字,历来都有人提出疑问,乃至对它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史念海先生即认为皇甫谧的数字“显然出于虚构”(史念海,1991)。国内一些人口史专家对夏朝初期中国总人口的估计数都比皇甫谧少得多,如王育民先生提出的数字是 135 万(王育民,1985),是皇甫谧记载数的 1/10;路遇、滕泽之两位先生(2002)则认为“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农业生产极其落后,到处还是‘人口极度稀少’、野无居人的原始社会末期,怎么会拥有人口 1350 多万?至于原始社会末期,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也很难作出准确估计。作个大胆的揣测,整个中国大地也不过三四百万人口。”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很有必要对当时中国范围内的总人口规模有一个估计,总是说“无从知晓”(史念海)恐怕也不行。其次,对于皇甫谧记载的数字,现在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确切的依据(“极其落后”、“人口极度稀少”等一类定性的说法作用是不大的)。但即使要“作个大胆的揣测”,也需要有一定的依据,否则岂不是毫无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可以采用迂回的方法,即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速度的对比,来对夏初时期的人口数作个参考性的估计。

关于期内世界的总人口,国际上已有大体上得到公认的估计数,即公元前 10 000 年

约为400万,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为500万~1000万,公元前3000年为2500万~4000万,公元前2000年为5000万,公元1年为1.7亿~3亿。^①按此推计,公元前21世纪当在5000万人左右,而不可能有太大的出入。近两千年来,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1/5或1/4甚至1/3,这一数据是确凿的,任何人都不会有所质疑。如果前一个5000万人,和后一个1/4或1/5,都得到肯定,那么就很容易推算出公元前21世纪中国的人口大约在1000万人,乃至更多,与皇甫谧的记载相当接近,可见其作为一个估计数并不十分离谱。皇甫谧的数字以后一再被《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等许多经典性文献所引述,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代学者中,对于皇甫谧的数字,赵文林认为“这种估计也不会差得很远”(赵文林,1988),段纪宪则认为“可能不如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毫无根据”,“不好简单怀疑它完全是杜撰的”(段纪宪,1999)。相反,如果当时中国人口仅为三四百万,甚至135万,只占全世界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恐怕与理无据,很难令人接受。要那样,必须首先推翻已经得到公认的有关史前世界人口的估计数。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速度进行对比,也有助于估计夏初的人口数。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年份的全国总人口数是得到公认,没有争议的。其中一个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多万人,一个是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4.1亿多人^②。根据这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出期内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众所周知,从西汉到清朝,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多有曲折,但总的说来生产力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显著超过此前的夏、商、周、秦等朝代是无庸置疑的。如果夏初时期的总人口是1000万人,则到西汉元始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6‰,低于前述的1.04‰,显示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率有所提高。但如果夏初时期的总人口是三四百万,到西汉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6‰;如果夏初时期的总人口是135万,到西汉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更将高达1.82‰。那样就会面临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尴尬问题:为什么历史向前推进了一两千年,中国的人口分布范围和耕地面积显著扩大,生产技术有很大进步,引进了许多新的粮食作物品种,并且屡屡出现盛世,兴起了一批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率却反而大大低于夏、商、周时期?在这里,人口发展归根结底要受到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制约的规律还起不起作用?

根据以上所述,把夏初时期中国的总人口估计为1000万人左右,或稍多一点,是较为合理的,它既有来自皇甫谧的史料依据,又与其他来源的推断相符。从距今1万年前原始农业出现到夏初时期,中国人口每1000年的增长率为40%,比旧石器时代的不到1%加快了许多倍。这与《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提出的“据推测,在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世界)人口大约增加了16倍”(巴勒克拉夫主编,1982)也是比较符合的。

除了人口发展缓慢及数量的稀少外,原始社会人口地理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空间分布极不平衡。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相对稠密,其人口密度高于长江中下游,更高于其他地

① U. N. 1973.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Trends*. Vol. 1.

[苏]瓦连捷依著. 1978.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译. 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5.

[美]麦克埃瓦德著. 姜天明译. 1989. 世界人口史图集. 辽宁人口信息, 各期.

[美]柯克斯著. 王在德译. 1978. 农业生态学. 北京:农业出版社, 4.

② 经专家修正的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中国总人口为38310万,见曹树基. 2001. 中国人口史(清代).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704.